

時候到了。那又怎樣！

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展這一季最後的戲劇節目，由天打那推出《時候到了》。原先劇本構想來自一張裝置藝術的草圖，導演和裝置設計者經過感應、理解、衝突，而激盪出「劇場空間」和「戲劇形式」。我們邀請導演和裝置設計者在此與讀者分享意念構成、實際發展的過程。

王也民（劇場工作者）

面對生活，心是虛的。

這些日子，老覺得我這身軀殼怪怪的，不太像是我的；不實在，空空盪盪的。吃飯、睡覺、走路、講話都覺得只是在盡義務。而這個義務是什麼，也不清楚。感覺像是空氣，很飄忽、很虛幻。

有時會想：到底我有沒有活著呀？可是，當我的手摸著那微凸的小腹時，啊，這就是我！感覺是那麼地實在、那麼地真實。

日子是那麼地充實。不斷遊走在電影、表演、音樂會、書本裡，沒事就和朋友打打屁，要不就正經八百地討論事情。可是，我的生活，就像是手中的香煙：刺激地吸入體內，然後呼出成一攻即破的煙霧。

曾對著自己喊：生活不該是如此！

可是，生活該是什麼呢？生命不必這麼嚴肅吧？日子也不用過得這麼認真吧！反正躺也是一天，做也是一天，想也是一天，發呆也是一天，就讓日子順著過好了，何必陷自己於苦痛之中呢？

我清楚，我漂浮；我模糊，我焦灼；我失焦，我消逝。

終於，我看不到我的臉。

上面的這段文字，是我在當兵時所寫的。它記錄著我當時的心情與困頓：一個絕望頹唐瀕臨潰敗被靈魂遺棄的肉身。自鏡中，我找不著自己，形體已然

消逝，而心卻陷入煙霧裡，找不著出路。

心靈圖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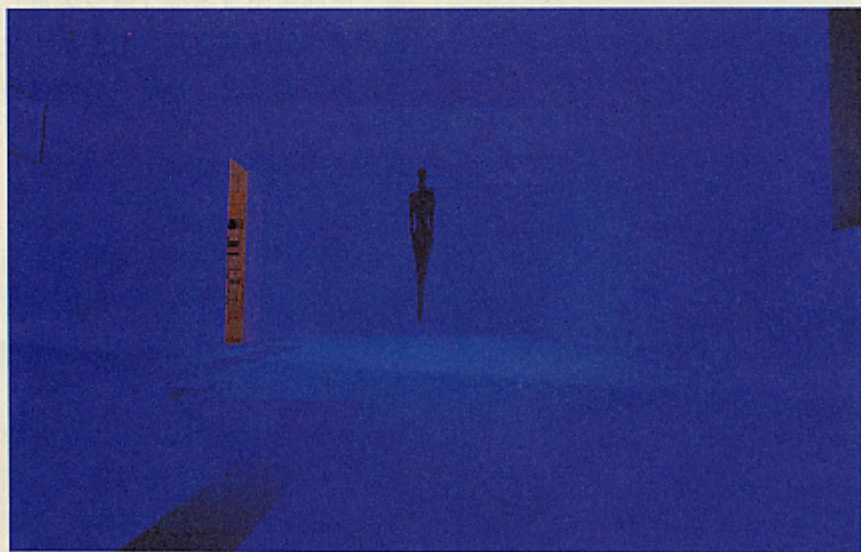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有一天，看到了一幅草圖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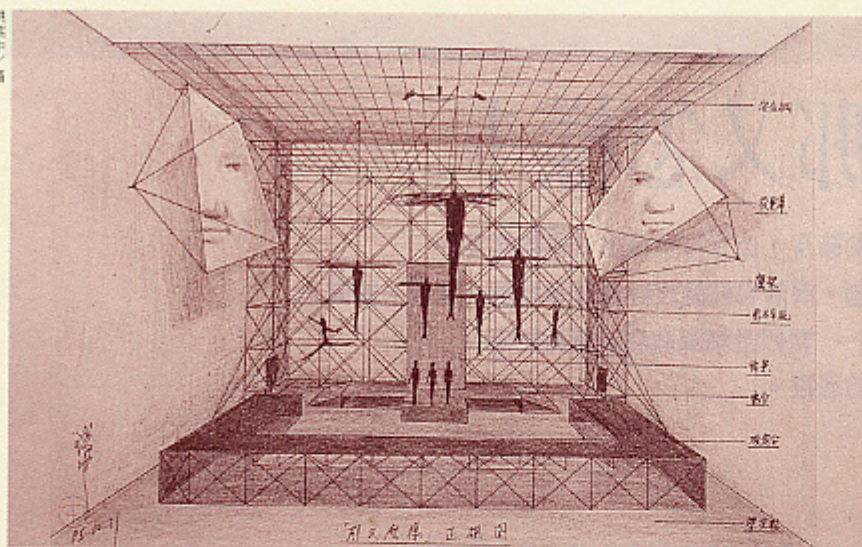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個封閉的空間：地面上佈滿著由洗衣粉構築成的海洋，在螢光燈管的肆虐下，整個空間，失去了重量。一個失重的重力場。

海，是呼吸的。在呼與吸之間，一個個漩渦不住地將重力化散。上方，懸吊著一個個焦黑的瘦長軀體。頸部的葉扇，緩緩地轉動著，發出低迷的聲響。高台上，一個人面對這空間，斜舉右臂，像是向這些漂浮的人體致敬。

是的，致敬！

1996《反攻大陸行動序篇》的漂浮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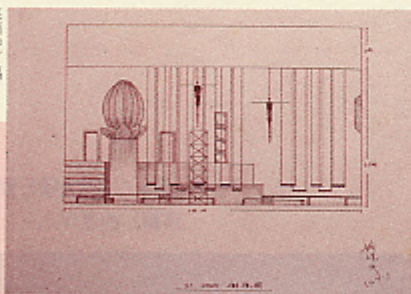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那又怎樣》漂浮人
正視圖。

天打那實驗體《時候到了》

6月1日~7日

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



舞台裝置側視圖。

這是姚瑞中的裝置作品圖。在圖中，我彷彿看到我自己的身影漂浮其中。也看到了許多我的朋友們，他們都同我一樣一塊兒地漂浮。我看到了現實生活中的自我。

錯愕地面對著漂浮的我，驚懼不安，全都寫在臉上：那真的是我嗎？我的雙腳不是應該踩在地面的嗎？我怎麼會是這樣子的？到底我發生了什麼事？為何看到「真相」，我會如此焦慮不安？

經過一番思索，我提出了一個假設，以便給自己一個「合理又安全」的藉口：

因為「教育」提供我一個「信以為真」且堅信不疑的「自我定位的概念」。所以，當我看到了我那「真實的定位」時，頓時無法接受這「定位的真相」並處理開始混淆的自我信仰觀念與情感。

於是：我的定位真的是我自己的定位嗎？還是，我所以為的定位，其實都是經過「虛化」的，或者是透過「教育」而進行虛化的？在這個資訊接收先於感受的年代裡，我一直認定的定位，在現實的世界中，不斷地遭到質疑、揭穿，以致於對自己開始產生懷疑、開始動搖、不知所措。

如果我原本就是生活在半空中的，可是，從一出生就不斷地被灌輸教育說我是活在地面上，並習慣於這「偽重力場」的引力束縛，那麼從一開始，我就是活在一個被虛擬的世界裡。當某些現象發生，當我開始質疑時，這個地面世界就開始瓦解，當世界消逝的時候，我失去了習以為常的「重力場」。可是，另一個世界、另一個重力場還沒有出現，面對這無法施力的狀態，我迷失了方向。

為了解決這個困頓，我不得不承認、接受我原本就是活在半空中的事實。

漂浮在時空中

為了讓觀眾親身體驗「漂浮失重」的感覺，初步構想是讓觀眾懸吊於空中，之後因技術及經費問題，才改以「彈簧席」取代，努力保留這種「漂浮」的狀態。

姚瑞中（裝置藝術工作者）

九四年夏季，我和 Birdy（王也民）相繼入伍，天打那實驗體也暫時藉此機會沈澱一些想法。在當兵時的深刻感觸則藉短暫的休假與 Birdy 交換一些想法。九五年初，在幾張我為裝置作品設計的草圖上，我們有了初步的共識：即「漂浮」、「疏離」、「冷漠」、「不在乎」為我們這一代集體性現象症候群。從生活上

衍生至政治上，最明顯的就是一九九七年，香港由兩大帝國的交接上，反射出台灣面對「回歸」的抗拒；由早期的「反攻大陸」到近來「保衛台灣」的轉變上發現：歷史神話因為政治現實是可以逆轉的。因此，以往那種嚴肅、認真的血統之爭，是否只不過是另一個歷史權力交替下的媚俗潮流罷了？

開始企劃

於是，我開始動手寫《那又怎樣》的企劃案及劇本故事。《時候到了》最原始的名稱。主要情節是描述一個生長在正常、普通且幸福的單親家庭的獨子，在他第一次進出女人的身體後，毫無愧疚地親手結束他父親的生命。）

在最初的角色設定上，我將每一個角色所遇到的問題，都設計成和「認同」（自我定位）有關。每一個人都是因為不肯、不敢、不知如何處理或是從未意識到這個問題，而使得他們的生活（生命）顯得虛幻不實。接著，我將每一個角色的問題更明確的擺在情感與肉體上。雖然角色彼此的關係是清楚的、理所當然的。但是，越是理所當然的關係越容易因為毫不加思索的「理所當然」的行為而使得彼此的距離越大。因此，每一個角色其實都是個孤立、或是被孤立的個體。但是由於角色的介入，使得我在考慮作品的呈現上陷入了一個困境。這個困境是源自作品初始構想時的原始衝動。

在最初的設想裡（那時連故事、角色

那麼除此之外，我們還剩下什麼？是嘉年華會式權力交接所刺激的消費運作？還是文人鬥士聲言的救國抱負，鼓動另一次天安門？

這是一個沒有彼岸的世界。關於救贖，或者歸處，只有無盡的漂浮及自我放逐。通過電話，電話板傳送的聲波，我們藉著不斷與他人連結中，才得以找到「自我」可能的定位。而孤獨依然伴隨，歷史如風，比雲還淡，甚至輕於鴻毛。「失重」不只成為托辭，它令人麻木自在。

於是從第一次構想《反攻大陸行動序篇》的漂浮人發展到有展演內容的《So What》後，就不停圍繞這個主題加以深化。為了讓觀眾親身體驗「漂浮失重」

都尚未浮現），希望這個作品，能以感官為主要訴求；也就是說，希望能在感官的渲染下，將觀看者帶入那種「漂浮」、「疏離」、「冷漠」、「不在乎」的世紀末情境狀態中。於是，我將感官中的視覺意象及聽覺意象作為整個作品在形式上的主軸。希望能在透過視覺意象聽覺意象相互交融建構的「感官流」中，將故事述說出來，並導引觀眾的觀看情緒，帶入事件角色中或是仲裁者。

視覺意象，在這裡指的是影像媒材、表演者、物體道具、燈光等，結合現場的空間裝置所形成的畫面。而聽覺意象指的是現場的演唱。

現場 MTV

由於整個空間像是一個氣氛詭譎的 PUB，而在一般的 PUB 裡，現場演唱（或是音樂）常常與吧台上的電視畫面內容沒有關係，舞池中蠕動的軀體彼此間也沒有絕對的關係，在那樣的空間裡，越是擁擠、人與人甚至人與其他物體間的關連越是模糊。由於 PUB 這樣的特殊氣味與故事中角色的情境相符合，因此，最後的空間被確立了。而整

的感覺，初步構想是讓觀眾懸吊於空中，之後因技術及經費問題，才取以「彈簧席」取代，努力保留這種「漂浮」的狀態。到了第三個版本《時候到了》（原《So What》）又推翻發展完成的裝置，將整個地板由原本鋪滿螢光粉的陷落空間，加上從電話線路板中得到的靈感，在整個實驗劇場的空間內，將電話 IC 電路板放大，供觀眾行走或坐臥其上，同樣也有強烈懸浮感，另外又有過獨木橋時的那種不安，並解決了一直困擾著我們的問題——觀眾席。在此，觀眾也成為一個個電子訊號，流動在整個空間裡，成為整個概念的一部分。

在每個 IC 電路走道下，都置放螢光燈管照明，鋪於電路走道下的螢光粉，

個作品也定位為：在一個有現場演唱的 PUB 裡所進行的一場現場 MTV。「現場 MTV」的意思就是置身在電視 MTV 的畫面現場觀看一支 MTV。當呈現方式大致被確定下來時，問題卻也因此產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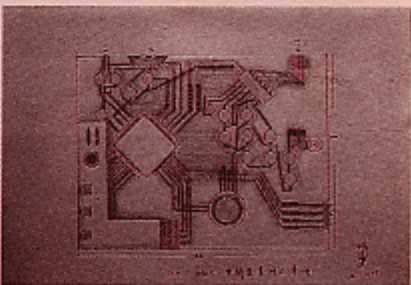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麼一個的空間裡，要如何將焦點放在一個有對白的情節表演上呢？若是完全沒有對白，那麼一些觀看者所需要的線索又該如何傳遞透露呢？要如何整合這些媒材於一體而又能保持 PUB 的氣質？若要詳細交代所有的背景線索，這樣的空間（甚至是劇場）適當嗎？我有這個能力去完成嗎？有必要將所有關於「情節」的部分都述說出來嗎？影像在這裡可以展現的力量在哪兒？現場的演唱是會與影像及現場表演者相互衝突、相互干擾嗎？

在一連串的困惑與疑問下，迷亂的現場演唱被保留，華麗詭譎的螢光空間裝置被保留，影像媒材被保留，表演者被保留。似乎「元素」都被保留了，而攸關作品呈現的脈絡，卻仍在掙扎與相互鬥爭……

配合現場其他絢麗強烈的燈光，企圖營造一個繽紛卻冷感的疏離氛圍。

若說這個作品提供了些什麼思考方向，那麼其姿態可能不在於承認我們是誰，而是在於拒絕我們是誰。

在世紀末的華麗喧囂之外，終有無法逃避的孤絕陪伴。



仍處於不斷變動的舞台設計。